

出版家
报人

陈翰伯

42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家
張人

陈翰伯



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1

报人出版家陈翰伯

高 崧 胡邦秀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报人出版家陈翰伯

高崧 胡邦秀 编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中 国 铁 道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经 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5.25 字数 106 千字
1990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 定价:2.35 元

ISBN7-80002-173-4/G·33

目 录

序.....	李 普(1)
陈翰伯自传.....	(5)
记陈翰伯.....	陈 原(7)
记翰伯	唐 琼(12)
把一生奉献给新闻出版事业	郑森禹 杨学纯(14)
在敌人心脏地区办报	
——陈翰伯在《联合晚报》	姚芳藻(20)
忆翰伯	冯亦代(30)
上海延安东路一座小楼上	袁 鹰(34)
怀念陈翰伯	徐亚南(39)
往事云烟	唐达成(43)
青春办报 皓首出书	高 崧(51)
在斯诺的小客厅里	陈翰伯(69)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陈翰伯(81)
在白区新闻战线上	
..... 陈翰伯口述 高 崧 胡邦秀整理	(117)

序

李 普

我最后一次跟翰伯把晤，是 1988 年在纪念重庆《新华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的集会上。我说：“我到新华日报工作，正式进入新闻界，是要感谢你的。”他说：“你就应当打这儿写起。”他指的是写回忆录。

我不写回忆录。我的经历和作为太平凡，不值得写。只有这件事，却一再给人讲过。1939 年，我从湖南亡命贵阳，找了一份工作。一位朋友介绍我在业余给左翼的“全民通讯社”当特约记者。我写的两篇贵阳通讯都被采用了。第三次寄稿的时候，我附了一封信，说：有个青年想当新闻记者，你们还要人吗？回信说要，是谁呢？我说就是我自己。对方说：那好，请你到重庆去找我们的社长吧。回信的是编辑部，在成都。我辞掉职务来到重庆，不料社长说：“实在对不住。编辑部不知道我们财政困难，再多一个人也养不起。”我无处可去，只好留在重庆找机会，后来就进了新华日报。

1942 年，翰伯也来到重庆，在《时事新报》。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记者朋友很快就跟他熟悉了。他比我们稍大几岁，学识和经验远在我们之上。有一次谈天，我说起我这段故事。翰伯

以他那爽朗的男低音大笑着说：“啊，你还不知道，给你写信的，就是我。你说的那个青年，我知道就是你自己。”他显然很得意。这是在他家里，在座的有高集、张维冷，还有翰伯的夫人卢琼英。在以后这将近五十年间，我同他虽然始终没有直接共过事，却时常有接触，彼此很关切。

大概由于这种缘故，我和他的亲友们送他到八宝山以后不久，高集给我打电话：“陈原回忆翰伯的文章你看了吗？写得极好，把翰伯写出来了。”

大概也由于这种缘故，当翰伯的两位高足把那些悼念的文章和翰伯自己的两篇回忆录汇集成这本书的时候，翰伯夫人点我的名，建议他们找我写一篇序。

我读着这堆文稿，时而热泪盈眶，时而悲喜交集。他做了那么许多事，连我这个忝为他的老朋友的人也惊愕不已。他活在那么许多有识之士心中，他们同我一样，至今视他为良师益友。这些，既使我满心酸楚，又为他深深欣慰。这个一生埋头干实事、常常爽朗地大笑的人，已经留下这一切，悄悄地去了。我忍住眼泪。我要平静地丝毫不带感情地告诉人们：陈翰伯这个名字是应当大写的，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过一辈子，就是不虚此生，就已经足够了。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期担任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在全市各大学复课之后，他参加考试，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扭转了中国之命运的西安事变中，他在事变领导者张学良将军所办的《西京民报》工作，很快由编辑而总编辑。那是1936年，他二十二岁。他一生主持过或参与主持过许多家报纸、通讯社和许多种刊物，其中有些是他一手创

办的。除此之外，举例来说，还有像《世界知识》那样的老牌杂志，长时期内，他是一名不挂名而定期参加编务的编委。

他从事的工作，每一项都是很不轻松的。1946年，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办《联合晚报》。这是当时我们党在上海出版的唯一的一份报纸，而且只能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周恩来嘱咐他尽一切努力坚持这个阵地，哪怕能多出版一天也是好的。又说：“什么问题都由你拍板决定，你不要也不可能事事都来问我。”他每天把从秘密渠道来的材料编发新闻；还要接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大声嚷嚷半天之后，马上写出稿件来。这些，他都不能假手于人。更伤脑筋的是，他不仅要千方百计同国民党反动派周旋，还得“对付”自己身边那许多只想猛冲猛打的青年同事。他必须不左不右，还必须当机立断。

1958年他转入出版界，先后主持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出版局。商务的任务是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中外语文大型辞书。出版那些“大洋古”的名著，每一本要加一篇序，表明出版者的立场和观点。有的，他自己写。别人写的，他要逐字逐句加以审核。

他自己说他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虽然当中略去了从事新闻教育和理论教育的一段，这八个字确实可以概括他的一生。我只想做一点注脚：办报的时候，他主要是致力于跟反动派作战；出书的时候，他关注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该奉献些什么和能够奉献些什么。他只是奉献。他从不索取。同他并肩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陈原说，他是个“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他确实是这样

的。这是说他的人品和风格。说到他的事业，从这本书还可以看出，他是个模范的革命文化人，是文化战线上一位战绩辉煌的战士。

我满怀崇敬的心情向读书界推荐这本书，推荐这个人。特别是对那些有志在文化领域里驰骋的青年朋友们，我想说的是，我深深相信，这个人和这本书，能够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1989年8月17日，于北京。

陈翰伯自传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天津党的一些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前往延安约一个月。1939年春到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各民主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1946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我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1949年初,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6月,改任新闻训练班主任。后训练班改隶新闻总署,定名北京新闻学校,我任副校长。1951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央宣传部,主持宣传干部训练班的工作,1953年调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虽接触面较广,但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二十二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驢吧。

1985年

记陈翰伯

陈 原

陈翰伯,《读书》创办人,1988年8月26日凌晨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他七十四年的勤奋生涯。他出生于苏州(1914),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毕生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新闻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26日傍晚,我从外地回来,在北京站口被告知,翰伯于当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直奔他家,见到了他的亲人,一切如旧,一堆堆新书杂乱地散在桌上,然而翰伯去了。我不相信翰伯真的去了,连他的夫人也不相信。然而翰伯不在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不紧不慢的男低音了。这几年他被病魔折磨,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快,一转眼就离开了我们。仅仅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我去外地前夜,我们几个熟人和翰伯在一起筹划着编一种冲破海峡人为障碍的出版物;那天,他体力不支,但兴致盎然。临别,他叮嘱我说:你回来再来计议。我匆匆出去了七天,又匆匆回来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翰伯,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了。

被朋友们戏称为“CC”的翰伯和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

往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这种友谊是珍贵的。他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解放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四十年前即1948年底，翰伯奉命撤离沪滨，北上天津转入解放区；我奉命南行香港，随后也经朝鲜入根据地。我们两家人话别时都料想不到仅仅四个月后又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晚会上重逢。解放了，我们都像松了一口气，但来往也少了。“大跃进”那一年翰伯调来主持商务印书馆——而我则在出版局工作。那阵我们几乎每天子夜都通电话，因为他习惯于夜间改稿，而我也只有在午夜才能思考问题。那是愉快的通话，那是互相了解的战友之间的通话，那是给我很多启发的通话。二十年后，我被调去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翰伯却在出版局工作。我们仍然在夜间通电话，不过不在子夜，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都受过那十年的摧残。在那十年中，翰伯和我，一起讲过“悄悄话”，一起坐过“喷气式”，两人被编成一个劳改小组，打扫厕所，打扫食堂——我们劳动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认真，翰伯做什么事都认真的，即使在“劳改”中，对劳动也“乐此不疲”。1969年我们同下干校，1972年同被“点名”调回京，以致干校同学们产生了幻觉，认为两个老“总”，一对CC，调离干校可能是对知识分子的好兆头。干校同学们的“海市蜃楼”很快破灭了：因为翰伯和我，还有范用，被好斗的“造反派”指斥为“陈陈范回潮复辟集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这顶帽子可能是合适的，如果反抗“四人帮”那种灭绝文化

的行动就是“回潮复辟”的话。我们懒得反击，更懒得“检查”。好容易在那黑暗十年中出现了一线光明，那就是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也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那时，很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人民。十三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十三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然而此刻，当大部头的中外文词书相继问世时，翰伯却去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的充满信心的声调了。

六十年代我们两人在海南军分区一位干部陪同下，到过“鹿回头”，到过“天涯海角”，见过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社会；八十年代我们两人又同十位有识之士去过伦敦，去过牛津，去过剑桥，去过巴黎。无论是在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这样，十年前当我躺在朝阳医院病床上“打点滴”时，翰伯同我酝酿办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就是后来在真理标准论争前后创刊的《读书》。八年前当翰伯躺在朝阳医院同一个病房“打点滴”时，我和他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他念念不忘文化积累，不忘文化传播，然而此刻，翰伯走了，他默默地走了，他在那天午夜过后悄悄地走了，没

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我深知，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世界，他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那样的精神境界。

这境界第一个界碑是正直。正直真难呵，连高尔基也曾说过，在俄罗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其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何尝不是这样。翰伯有时正直到令人吃惊的戆态。例如他相信读书无禁区。他认为下流的黄色的东西不是书，是垃圾，根本不在书林里。他坚持这样一个观念。他正直，他不会阿谀奉承，当他相信一就是一时，他就说是一，而不说是二。

正直而又有胆量，更难。他不怕难。他不怕偶像。他不怕“官”，也不怕“管”。他只服从真理。那十年我曾劝他少说话，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该说时就该直言，决不沉默。甚至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真正的观点。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是可贵的，同样可贵的是翰伯从来以平等待人，不管是什么人，除了恶人，他嫉恶如仇，可是对人，善良的人，真正的人，甚至懦弱的人，他都掏出心来，平等对待。这几年病魔缠身，他常常带有点火气，但也掩不住他心中的那股热气。因为他正直，不会吹，不会油腔，不会打官腔，有时人觉得他有点冷——有时觉得他有点漠然。用时下的话说，那是表层结构，他的深层结构是热心肠；为了使干校同学脱离无期的“苦海”，他做过多少努力，挨过多少讥讽呵。

翰伯的精神境界是现实的：即使在近两三年恶病消耗了他的几乎全部精力时，他仍然念念不忘要吸收新知。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要我给他讲讲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我带了一部手提的能打字、能绘图、能存储的电子书写器去看

他，他聚精会神地看我“表演”了近一小时，然后筋疲力竭地、满足地笑了，他说我总算知道一点新的技术了。至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风云变幻，他也时刻注视着，他常常找人去给他“传递信息”。他要作准备：万一有一天战胜了病魔，他还将带着新的思想去参加战斗。

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这就是陈翰伯。

1988年8月

记翰伯

唐 琼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他出身于老燕京，但身上有许多非燕京的东西；他很早就和斯诺相熟了。他也做官，但一无官腔，二无官气；他是个正直而勇敢的人，有才有识，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实干家。那些本领不大而官腔十足官气扑面而来的老干部，我讨厌。

第一次的印象，往往有欺骗性质。多年以前在上海外滩，常有一个，不修边幅、头发长得近乎颓废派艺术家，在车站出现，我对那人打扮有兴趣，但不知是谁，有人便说：“喏，那不就是陈翰伯！”我怀疑自己年“少”眼花，办那张进步的《联合晚报》的就是他？这以前，在重庆也听朋友谈起过他。

后来他到了北京，办新闻学校，接着又当出版社总编辑。由于一个偶然的会，我竟和他共了几年事。他没有领导架子。大家对他很亲切，而且还有些敬畏之感，大概是他既有才能，又肯实干的缘故。他衣着朴素，爱抽烟，爱犯气管炎，常常咳得不亦乐乎。讲起话来，那声调就和“麒老牌”周信芳差不多。他而且有幽默感。

1972年冬，我们分别从外地的干校纷纷回到北京。在另